

中华书局的七十年

李 侃

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是近现代中国两个重要的出版事业单位。商务85年来出版各种图书两万余种，中华70年中出版各种图书八千余种，其中，许多图书（包括图书馆学、目录学、校勘版本学的图书）在读者中流传甚广，起到了一定的博古通今的津梁作用。图书馆与图书出版工作相依相成，熟悉它们的今昔情况，对于图书馆工作者很有必要。为此，我们特征得原作者同意，分期移植发表《出版工作》：《商务印书馆今昔梗概》和《中华书局的七十年》两文，发表时并经作者亲作订正，谨致谢忱。

今后我们还将陆续介绍一些其他出版社的情况。

——编者

一九八二年元旦，是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纪念日。七十年间，我们的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华书局也经历了新旧中国两段历史途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中华书局作为一个综合性的出版企业，在传播文化科学知识，促进教育事业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它成为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特别是一九五八年开始，它又担负起整理出版我国古籍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任务，更以崭新的姿态，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事业服务。

当我们满怀喜悦、振奋的心情，来迎接纪念中华书局成立七十周年的日子里，回顾一下中华书局七十年的历史，这对于吸取前人的有益经验，增强我们做好编辑出版工作的信心，是有积极意义的。

中华书局的七十年，可以分为前三十七年和后三十三年两大历史阶段。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它作为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出版企业，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经历了创业、发展、挣扎、衰退的途程。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它作为一个从资本主义的出版企业改造成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出版企业，在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又经历了新生、繁荣、挫折、兴旺的途程。不论前一个阶段和后一个阶段，它所经历的途程，都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化，留下了时代的足迹。现在，我们就分两个阶段作简略的叙述。

（一）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的中华书局

中华书局创办于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这个中国近代重要出版企业的诞生，是辛亥革命的直接产物。中华书局的创办人陆费逵（字伯鸿）先生，年青时代接受了维新思想和革命思想，一九〇五年春，在武汉参加了革命团体——日知会，积极从事革命宣传活动。一九〇六年冬，入上海文明书局当职员，同时兼任文明小学校长。一九〇八年秋进入商务印书馆，先后担任国文部编辑、出版部长兼《教育杂志》主编。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后，他预料清朝统治必被推翻，共和国行将成立，遂暗中与戴克敦、陈寅等计议策划，筹措资金，并加紧编写适合共和国需要的中小学教科书，同时准备自行建立新的出版机构。一九一二年元旦，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就在这同一天，已在筹划中的中华书局也应运而生。

关于陆费逵创办中华书局的经过，蒋维乔在《创办初期之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一文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约在民元前三年间，高梦旦常代表商务出席于书业商会，

屡与文明书局代表陆费逵见面，谈论之下，大异其才，……陆氏既能操笔编书，又于发行、印刷，头头是道，故梦旦佩服之。归言于菊生，“于是以重金聘为出版部主任。梦旦欲坚其心，又以侄女妻之”。“商务待陆氏之优，超出同侪。虽年久资深之馆员，皆不能望其项背”。“其时革命声势，日增月盛”，陆费逵看到革命形势的发展，旧的教科书必定不能适应革命后之需要。同时他也认为这正是实现抱负的好机会，于是在商务印书馆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即“暗中预备全套适用之教育书，秘密组织书局。于民国元年，中华书局突然成立，中华民国之各种教科书，同时出版，……伯鸿亦脱离商务，一跃而为中华书局总经理”。

从陆费逵脱离商务，自创书局的事实经过来看，固然带有浓厚的商业竞争气味，但是，他作为一个旧时的资产阶级出版家，却是一位很有见识，很有魄力，也很有才能的人物。

我们今天来评价解放以前三十七年中华书局在中国近代文化史和出版史上的地位，最主要的事实根据，就是看它出版了些什么书，这些书当时在广大读者中发生了什么作用和影响。

据不很完全的统计，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书局共出版各类图书约六千种。如果粗略分类，则其中有各类教科书四百余种，社会科学书籍近两千种，自然科学书籍六百五十余种，文学艺术书籍一千余种，重要古籍六百余种，各种工具书三十种，少年儿童读物八百多种；此外还先后编辑出版了二十种杂志期刊。

中华书局创办伊始，就是以出版发行教科书起家。而一直到后来，它也始终把出版发行教科书作为自己的主要业务之一。作为一个资本主义的出版企业，出版发行教科书，当然不免有着营利的目的，但是并不能因此就把旧时的中华书局看成是唯利是图的

书商。我们知道，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国家，教育事业极不发达。而陆费逵本人则是一个热心教育事业的人，同时也是一个具有爱国思想和民主主义思想的人。他在主持编的《中华初等小学国文教科书》和《中华高等小学国文教科书》的课文中，就有“我国旗，分五色，红黄蓝白黑。我等爱中华”。“民国成立。选举临时大总统。孙文以大多数当选。元年元旦。即任于南京。组织临时政府”。

“孙氏天姿卓越。性情敦厚”。“为共和奔走二十余年”。“为中国第一伟人”。这些爱国和民主共和的思想内容，比之旧的教科书，歌颂清朝的什么“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仿行宪政。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等等这些充满封建气味的内容来，确有耳目一新之感。陆费逵当过教师，主编过《教育杂志》，写过很多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教育文存》（共五卷）就是他写的有关教育的文章的集结。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能够以认真严肃的态度，编辑出版大量的各种教科书，这对于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普及科学文化知识，应该说是具有积极作用的。

说到教科书，这并不是中华书局的首创。大约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开始，外国在中国各地的基督教会附设的所谓“学堂”，就编印过算学以及宣扬西方文明的“教科书”了。其后，国内的一些书局、报馆、书院也编印过多种取代过去“蒙童读物”的教科书，但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则要数文明书局和商务印书馆。而辛亥革命以后，首先编印适合共和民国需要的教科书的，则是中华书局。中华书局历年出版的教科书主要有：一九一二年出版的《新中华教科书》，一九一三年范源濂任编辑长时编印的新制教科书，其中有《新制初小教科书》、《新编初小教科书》、《新制高小教科书》、《新编高小教科书》、《中华高小教科书》、

《中华中学教科书》等多种。此后，各种名目的教科书不断出版发行。现在，这些教科书早已陈旧过时，成为图书馆和博物馆的藏品了，但是在当时却是广大青少年学生的“启蒙”之书。现在五六十岁以上的知识分子，他们之中的很多人就是在中、小学时代，从中华书局出版的各科教科书中，得到基础文化科学知识的。

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主要是供小学和中学所使用的，此外，也出版过师范教科书和《大学用书》。

这里应该特别提到的是，中华书局在编印各种教科书的同时，很注意出版少年儿童读物。一九一四年创刊了《中华童子界》、《中华儿童画报》。一九二二年又创刊了《小朋友》。一九二六年出版了《小朋友画报》。此外还先后出版了《中华学生界》、《少年周报》、《中华少年》和《初中学生文库》等中小学生课外读物。在这些少年儿童读物中，以《小朋友》的内容最为丰富，影响最大，历时最久。它不但受到广大少年儿童的欢迎，也得到了各界人士的好评和重视。

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在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中也占了相当重要的比重。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这三十七年，是中国社会发生激烈动荡、深刻变化的历史时期。这期间发生过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发生过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发生过抗日战争和人民解放战争，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在革命和反革命、侵略和反侵略、新思想新文化和旧思想旧文化的斗争中，中华书局虽然没有站在斗争的前列，但它也没有站在与革命的对立方面。而在它的职工群众中，则不乏革命战士和爱国人士。著名的上海工人运动领导人、上海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华烈士，以及宋锦玉、汤炳南、秦源泉三烈士，就是在“五卅”运动和大革命时期英勇牺牲的，在抗日战争中，书局的很多职工，

都能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下，坚持抗日爱国立场，继续从事维护中华民族利益的出版事业。

如果我们考虑到中国近代文化革命的历史特点，把中华书局出版的社会科学和文学艺术书籍，放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加以考察，那么它在“五四”以前的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中，在“五四”以后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中，以至抗日统一战线的文化事业中，应该说它所起到的作用，就其主要方面来说，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例如它在介绍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学说和自然科学方面，于一九一八年出版了马君武翻译的《民约论》全译本，一九二〇年开始出版的《新文化丛书》（其中包括马君武翻译的达尔文著《物种原始》）和一九三〇年开始出版的《社会科学丛书》都不乏有价值的著作。此外还先后出版了一些中外学者关于政治、经济、法律、教育、历史、地理等方面的著作。一九二一年它所出版的李达翻译的《唯物史观解说》、《社会问题总览》这种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书籍，虽然在它的出版物中所占比重极小，但是在当时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文学艺术书方面，它在一九二二年出版了我国最早的新体诗刊《诗》。一九三六年出版了张闻天的《青春的梦》；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和《暴风雨前》。一九三九年又出版了李劫人的《大波》。在介绍世界文学名著方面，先后出版过田汉翻译的莎士比亚名剧《哈孟雷特》和《罗密欧与朱丽叶》；李劫人译的福楼拜名著《马丹波娃利》；郭沫若译的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在美术方面，一九三二年出版的《齐白石画册》、《徐悲鸿画集》、刘海粟编的《世界名画集》以及郑午昌的《中国画学全史》等，都有很高的美术价值和一定的学术价值。

中华书局在校印和影印古籍以及编辑出版各种工具书方面，也给予了相当的注意。一九二一年开始排印聚珍仿宋版《四部备要》，第一集出版之后，陆费逵于一九二四年十月撰写了《校印四部备要缘起》。此书分为五集，共收经、史、子、集各种古籍三百五十一种，一万一千三百零五卷，分订线装二千五百册；一九三四年又出版布面精装十六开本一百册，纸面平装十六开本二百八十册。这是一部内容比较完备，方便适用的大型古籍丛书。从一九三四年开始，又影印《古今图书集成》。此书系根据雍正铜活字本影印，全书共一万卷，目录四十卷，五千零二十册。影印时用三开本，共五万余页，分订八百册，于一九四〇年全部完成。陆费逵在《影印古今图书集成缘起》中称它为“洋洋大观之中国百科全书”。

中华书局还出版过不少综合性和专业性的工具书。其中比较重要，流传较久，使用价值较大的有一九一五年出版的《中华大字典》，一九一九年出版的《实用大字典》，一九一五年开始编辑，一九三六年出版的《辞海》、一九三七年出版的《外交大辞典》、《经济学大辞典》，一九四〇年出版的《中外地名辞典》等。这些工具书虽然不无缺陷，但是它们都曾起到自己应有的作用，有的至今仍然保留着一定使用价值和参考价值。

在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的多种期刊杂志中，以一九一五年创刊、梁启超任主任撰述的《大中华》和一九三三年创刊的《新中华》影响较大，前者在政治上虽偏于保守，但对袁世凯称帝和北洋军阀统治的腐败，有所抨击；后者在政治上倾向进步，主张抗击日本侵略和民主自由，并有不少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为它撰稿。这些以不同读者为对象的各种杂志，在传播科学文化知识，充实社会精神生活，促进学术研究等方面，都起了有益的作用。同时通过这些杂志，也密切了

读者、作者与书局的联系。

中华书局除了出版图书杂志而外，它还设有自己的印刷厂和发行机构。在总公司的统一管理下，设有编辑、事务、营业、印刷四个所，并设有藏书六十余万册的图书馆。到一九三七年，书局的资本增至四百万元，年营业额约达一千万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及香港、新加坡设分局四十余处，是当时国内少有的规范巨大的出版企业。

中华书局印刷厂原名为中华书局总厂印刷所。从一九一六年建厂后，几经扩充，到一九三七年已拥有设在上海、香港两个印厂，共有职工近三千人。在印刷设备、技术条件方面，当时不仅在全国，就是在东亚地区，也属首屈一指。特别是它的聚珍仿宋体、聚珍仿宋长体头号至五号字的全套铜模以及三号聚珍仿宋扁体铜模、字体精美，印刷清晰，受到广大读者的称赞。

在中华书局的创办和发展过程中，聘请、锻炼和培养了一批相当出色的经营管理人才和编辑业务人才。这些人员中除了创办人陆费逵之外，比较著名的还有戴克敦、陈寅、姚汉章、沈颐、丁辅之、吴镜渊、高时显、范源濂、舒新城、张相、金兆梓、俞复、唐驼、李叔明、吴叔同、郭农山、沈鲁玉、李墨飞、薛季安等，他们或者是出版家兼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或者是学有专长的专家学者；或者是有才干的经营管理人。

上面，我们简略地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前三十七年间中华书局的历史概况，并且着重于介绍了它所作出的成绩和贡献。勿庸讳言，生存在旧中国的一个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它不能离开当时的社会政治环境而孤立存在。由于社会的、历史的、时代的条件，和它自身的资本主义性质，它在作出一定的成绩和贡献的同时，也必然有它的局限和弱点，必然有它的消极面和阴暗面。对于这些，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去考察分析，而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实际作过苛

的要求，当然，我们也更不需要对它的这些局限和弱点、消极面和阴暗面加以掩饰。全国解放以后，党和人民政府对中华书局采取了团结、改造的政策，并使这个历史悠久的著名出版企业保留下来，赋予新的性质和新的任务，这个事实本身也就对旧时中华书局所作的最好、最公正的评价。

中华书局从诞生之日起，中间经过了不断发展，到一九三七年而达到全盛。抗日战争期间，虽然在困难的环境中得以生存维持下来，但其出版规模和业务情况，已非昔比。抗战胜利以后，由于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腐败和走向崩溃，中华书局的处境也每况愈下，到了全国解放前夕，它已经面临危机，只能勉强维持了。

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书局在旧中国走完了它三十七年的道路。

（二）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二年的中华书局

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华书局的全体职工和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迎了解放，庆祝新中国的诞生。中华书局也开始走上新的道路。

一九四九年秋季，中华书局就参加了由新华书店、三联书店、商务印书馆、世界书局、开明书店等二十三家书店和出版社投资成立的公私合营性质的联合出版社，共同负责出版由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统一编辑和审定的中小学教科书。一九五一年一月，又与三联、商务、开明、联营等五家出版社联合成立中国图书发行公司。一九五四年五月一日，在经过充分协商筹备之后中华书局实行公私合营。总公司从上海迁往北京，并与财政经济出版社合并，但仍以中华书局名义出版古农书、文史及俄国语文书籍。一九五七年古籍出版社并入中华书局，社址迁到东总布胡同十号。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五七年这八年中

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对农业、手工业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及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也主要是围绕这个时期的中心任务确定的。以后，随着情况的变化，中华书局的任务和出书范围也日益明确，从而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

一九五八年二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成立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齐燕铭任组长。同时指定中华书局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同年三月，中央文化部决定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中国文、史、哲古籍，并适当出版现代作者有关文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的专业出版社。同年五月，金灿然来中华书局任总经理兼总编辑，傅彬然、金兆梓任副总编辑。刘子章、王乃夫任副总经理。

中华书局这一新的任务确定以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和在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指导下，由于全体职工的努力，编辑、出版业务有了迅速的发展。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的八年中，它在古籍整理和文、史、哲研究著作的出版以及充实、培养编辑出版队伍、与学术界建立联系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将这一时期中华书局工作概况，分别简述如下。

第一，为了有计划、有选择、有系统地整理出版我国古籍，从一九五八年春季开始，就积极协助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及文、史、哲三个分组，分别制订关于中国历史、古典文学和古代哲学方面的古籍整理十年规划（草案），这个十年规划共包括我国古代的经、史、子、集各类重要古籍数千种，它的好处是种类比较齐全完备，缺点是数量过于庞大，重点不够明确，而且文、史、哲三个规划所包括的项目有不少互相重复。为了妥善解决这些问题，一九五九年三月，由齐燕铭主持召开了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第二次会议，讨论了“一九五七年——一九六二

年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情况、问题和今后的计划要点”。一九六〇年，又制订了《三至八年（一九六〇——一九六七）整理和出版古籍的重点规划》（草案）。这个重点规划共包括重要古籍一千四百五十种，计划在前三年每年出版一百五十种，后五年每年出版二百种。规划中还对整理出版的方针和做法，以及对不同读者对象阅读的各类古籍都提出了明确的意见和具体要求。这个规划确定之后，就成为后来整理出版的主要依据，到了一九六六年，规划中的重要项目大部分已经完成或已经落实了。

第二，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六年，中华书局共出版书籍约近一千种，其中各类古籍二百五十多种，学术研究著作一百多种。初步改变了前一个时期在古籍出版工作中由于缺乏统一规划而造成的零散、粗糙以及某些混乱状态，出现了一个兴旺繁荣而又注重质量的新局面。以中华书局的出版物为例，在此期间先后影印出版了《永乐大典》、《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观堂集林》、《册府元龟》、《太平御览》、《汉唐地理书钞》、《明经世文编》、《万历武功录》、《中西回史日历》、《琴曲集成》、《古本戏曲丛刊》第九集、《忠王李秀成自述》、《四库全书总目》、《湘报》等重要类书、文学总集、重要历史、文学资料。在古典文学方面，先后整理出版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元曲选外编》、《全唐诗》、《清诗铎》、《晚清文学丛钞》、《顾亭林诗文集》、《王船山诗文集》、《金元散曲》、《全宋词》等。在中国历史方面，继校点本《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之后，开始了“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从一九五八年开始，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和中华书局就将整理“二十四史”列为规划中的重点项目，并制订了具体的整理方案和组织国内外许多史学专家，分头进行整理。到一九六六年为止，前四史的《史记》、《三国志》、《汉

书》、《后汉书》已先后出版。此外还整理出版了《突厥集史》、《历代各族传记汇编》、《国榷》、《明通鉴》、《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宋大诏令集》、《通鉴纪事本末》等。在近代史料方面先后出版了《光绪朝东华录》、《近代史料笔记丛刊》、《辛亥革命回忆录》、《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义和团运动档案史料》、《林则徐集》、《廖仲恺集》、《中国铁路史资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在古代哲学方面，则先后出版了《太平经合校》、《焚书》、《续焚书》、《周易外传》、《尚书引义》、《晏子春秋集释》、《论语译注》、《孟子译注》以及《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

在整理出版文、史、哲各类古籍之外，还出版了现代作者学术研究著作，主要的有：杨树达的《积微居读书记》、陈登原的《国史旧闻》、陈垣的《通鉴胡注表微》等专著多种《余嘉锡论学杂著》、顾颉刚《史林杂识初编》、汤用彤的《往日杂稿》以及其它学者的一些论文集。

在此期间，中华书局还出版了吴晗主编的《中国历史小丛书》和《历史丛书》。到一九六二年《中国历史小丛书》已出满了一百种。

随着编辑出版业务的发展，中华书局的编辑力量也在不断充实和加强。丁树奇、肖项平分别于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来书局任副总编辑。在此期间，除原来的卢文迪、姚绍华、章锡琛、曾次亮、张静庐、徐调孚、陈乃乾等著名编辑出版工作者外，还先后调来了巩绍英、宋云彬、杨伯峻、马非百、傅振伦、马宗霍、孙人和等从事编辑工作。这些学有专长、经验丰富的老编辑和一些全国解放以后成长起来的中、青年编辑人员，形成了一支有相当业务水平和学术水平的编辑队伍。

为了培养整理古籍的编辑干部，一九五九年经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讨论，并与高等教育部、北京大学协商，决定在北京大学中文系设置古典文献专业。这个专业到一九六六年已有三届学生毕业，其中三十余人充实到中华书局编辑部。

中华书局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得到了国内许多教学单位和科学研究机关的支持，并与许多学术界人士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已故的学者郭沫若、范文澜、杨东莼、陈垣、翦伯赞、吴晗、邓拓、何其芳、杜国庠、黄松龄、汤用彤、顾颉刚、魏建功、邵循正；和健在的学者侯外庐、郑天挺、白寿彝、翁独健、邓广铭、唐长孺、王仲荦等等，都是中华书局的热心关怀者和支持者。他们不但经常对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提意见和建议，而且有些学者还直接承担了重要的整理项目。在“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中，就集中了国内十几位史学专家来书局亲自进行校勘和标点。

一九六一年十月，中华书局由东总布胡同迁往西郊翠微路二号大院，这不仅仅是一次办公地址的迁移，而是标志着中华书局业务的蓬勃发展。

一九六二年一月，书局的全体职工，满怀激情，迎来了中华书局成立五十周年。在一月四日举行的纪念会上，齐燕铭讲了话，陈叔通、叶圣陶、胡愈之、翦伯赞、吴晗、魏建功、黄洛峰、陈翰伯、陈原出席了纪念会。许多著名学术界人士送来了贺信、题词和绘画，表示祝贺。郭沫若同志的题词是：“五十年间天地改，中华文运更辉煌。梯航海通今古，鼓扇雄风迈宋唐”。齐燕铭同志的题词是“五十年来负盛名，当时共许槧刊精。人民作主开新纪，文彩风流迈旧型。校理故籍千载业，切磋疑义百家鸣。社会主义光芒大，夕秀朝华启后生”。郭、齐两位的题词，对中华书局的工作给了热情的赞许和鼓励。

正当书局的全体职工，勤勤恳恳，满怀信心地为更好地整理出版我国古籍，为社会主义的文化建设事业作出更多的贡献的时候，情况开始发生了变化。

一九六四年，文化部进行“整风”，齐燕铭同志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不久他就调离了文化部，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的工作也随之陷于停顿。同年，书局的一部分干部到农村去参加“四清”运动。书局的业务虽然还在继续进行，但是已经受到了严重影响。

一九六五年十一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成员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出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信号。在这篇诬陷吴晗和别有用心黑文中，指名诬陷中华书局出版的吴晗写的一本《中国历史小丛书》中的《海瑞的故事》。从此，中华书局的正常业务完全停止，总经理兼总编辑金灿然也脑病复发。

一九六六年五月，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以“文化大革命”为名，为中国人民制造的灾难开始了，中华书局的灾难开始了。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彻底砸烂”声中，中华书局被诬陷为“大黑窝”、“右派集中营”、“毒草制造厂”，从金灿然、丁树奇、肖项平一直到各部室的负责人，以及许多老编辑和中年编辑，都加以各种罪名，受到迫害和冲击。业务完全停顿。

一九六九年九月，全体职工都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一九七〇年开始陆续从“干校”抽调一部分人员回到北京，但这时中华已同商务合并，社址从翠微路迁到文联大楼。而古籍整理出版业务，仍然没有恢复。

一九七一年二月，周总理指示：“‘二十四史’还要校点。‘二十四史’和《清史稿》除已校点者外，都由中华书局负责组织，请人校点，由顾颉刚总其成。”当时“出版口”根据周总理的指示写了报告，经毛主席批示同意。至此，中断了五年的“二十四史”整

理工作又得以继续进行。并再次调集白寿彝、刘大年、翁独健、张政烺、唐长孺、王仲荦、孙毓棠、陈述、王毓铨、陈仲安、启功、王钟翰、阴法鲁、周振甫等来书局从事尚未完成的各史及《清史稿》的整理工作。其中《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和《宋史》由上海组织人力进行整理，但仍用中华书局的名义出版。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三年，书局的绝大部分职工虽然陆续从“五七”干校调回，但实际上只有一个编辑组承担原来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而主要的业务，也就是整理“二十四史”。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陆续出版了《周书》、《南齐书》、《北齐书》、《陈书》、《隋书》、《梁书》、《晋书》、《宋书》、《北史》、《魏书》、《明史》、《辽史》、《金史》、《南史》、《元史》、《清史稿》也开始分册出版。

一九七六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华书局的业务渐次有所恢复。一九七八年三月，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重申中华书局为整理出版中国古籍的专业出版社，具体任务是：（一）整理出版中国文学（包括语言文字）、历史、哲学方面的古籍，影印某些珍本，善本或重要古籍。出版有关的资料汇编和专业工具书。（二）组织出版今人关于中国古代和近代文、史、哲方面的研究著作。近代人在这方面的研究著作，也有选择地出版。适当出版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史哲问题的有价值的著作。（三）适当出一些选本、译注本和知识性读物。

到一九七八年春季，校点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全部出版，从五月下旬到六月初，新华社、《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对“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进行了专题报导。

一九七九年八月十一日，国家出版局宣布中华书局恢复“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建制。根据工作需要，设立编辑、出版、经理

三个部，编辑部分设古典文学、古代史、近代史、哲学、历史丛书、《文史》杂志等六个编辑室。

至此，在十年内乱中被摧残破坏的中华书局，又开始走上正轨。长期停顿的编辑出版业务，也开始有了明显的进展。从一九七七年到一九八一年的五年中，共出版书籍四百七十五种。

由于“文化大革命”以前的八年中间，对许多重要古籍已着手组织力量进行整理，并储存了一部分已经完成的书稿，因此，在恢复建制以后的五年中，一方面在出书数量上有明显的增加；一方面也适当注意了出书的系统性。在中国历史古籍方面，在出齐了“二十四史”之外，还出版了从《左传纪事本末》到《明史纪事本末》的纪事本末体史书，重印了从《资治通鉴》到《明通鉴》的编年体史书。与此同时，还开始陆续编辑出版和恢复出版一批史籍丛书，如《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中国古代地理总志丛刊》、《中外交通史籍丛刊》、《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元明史料笔记丛刊》、《清代史料笔记丛刊》、《清代档案史料丛编》、《近代人物文集丛书》等多种。在古典文学方面，已出版了《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古小说丛刊》。属于文学总集的《乐府诗集》、《全金元词》也已经出版。在语言文字方面，出版了《甲骨文合集》八册及《小屯南地甲骨》。在古代哲学方面，出版了《荀子新注》、《论衡注释》以及一些古代哲学家的代表性著作。《中国历史小丛书》也加强了选题的计划性和系统性。

近五年中，除整理出版古籍之外，还出版了一批现代学者的研究著作，如陈垣、洪业、郑天挺、齐思和、夏承焘、于省吾、王季思、高亨、孙毓棠的学术论文集；钱钟书、王力、朱东润、汤用彤、吕澂、王仲荦、启功的学术专著等等。

“文化大革命”前由《新建设》编辑部

编辑的《文史》杂志，也于一九七八年复刊，从第五辑开始改由中华书局编辑出版，现已出至第十一辑。不定期的学术性随笔刊物《学林漫录》，从一九八〇年开始出版。一九八〇年又创办了《文史知识》杂志，从一九八二年开始，改为月刊。

古籍和工具书的影印工作，也有了初步的进展。除《文苑英华》、《甲骨文合集》之外，还影印了《文选》、《琴曲集成》、《五朝诗别裁》、《词综》以及《中华大字典》、《康熙字典》等。

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七月七日，陈云同志先后两次指示要把古籍整理抓紧搞好。并对整理的规划和方法等问题提出了重要意见。同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又发出了《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为今后的古籍整理工作指出了方向和奋斗目标。指出“把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当前要认真抓一下，先把领导班子组织起来，把规划搞出来，把措施落实下来”。中华书局的全体职工，都以能够为这一光荣艰巨的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而感到欣幸。

现在，我们伟大祖国已经进入以建设高

度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中心任务的新时期。可以预期，我国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也将以空前的规模，更多样的形式和更快的步伐，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这是一种继往开来、意义深远的宏伟事业。中华书局的全体工作人员，将在这个伟大的时代，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为振兴中华，而作出最大的努力。

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这篇简述中华书局七十年历史的稿子，是在时间很仓促的情况下写成的。加上笔者对中华书局的历史所知甚少，材料又很不完备，因此，疏失错误之处，殆不可免。这里提供的只能算一个草稿，热切希望熟悉中华书局历史的同志们提出宝贵意见，以待来日修改补充，使它稍为完整、全面一些。

一九八二年三月十七日到二十四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讨论制订一九八二——一九九〇年的古籍整理出版九年规划，中华书局作为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办事机构和专业出版社，肩负着更加繁重的任务。现在，中华书局正在根据规划小组的九年规划，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着手制订书局本身的书籍出版规划。力求在不远的将来，切实作出比较显著的成绩。

作者附识

一九八二年五月四日

